

#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李建民

**【摘要】**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关键词】**生育悖论;低生育率;生命历程制度化

**【作者简介】**李建民(1955- ),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E-mail:lijianm0075@163.com(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2024.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0&ZD173)。

## 一、引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将出现从高水平转向低水平的变化过程。因此,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化水平与人类生育率之间存在一种负向相关关系。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为了一个“例外”。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sup>①</sup>,2020-2022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下降至1.30、1.15和1.07,2022年只出生了956万人,出生率仅为6.77%,202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902万人(出生率为6.39%)。在一个幅员辽阔并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度里,在个体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没有了计划生育政策强干预的背景下,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且现代化尚未完成的发展阶段,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生育率降到如此之低的水平?这种相对于现代化水平而言的超前低生育率状态成为一个迷思现象,笔者将此称之为“生育悖论”。

近年来的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对生育率直接影响因素及中间影响变量的人口学解析<sup>[1-3]</sup>,在社会变迁和综合性宏观视域下的观察<sup>[4-5]</sup>,从女性发展、社会和家庭性别平等角度的分析<sup>[6-7]</sup>,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及文化堕距与文化困境等

理论框架下的研究<sup>[8-10]</sup>。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其中主要包括:生育文化的家庭场域与社会建构假说<sup>[11]</sup>、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假说<sup>[12-13]</sup>、竞争偏好假说<sup>[14]</sup>、绝对收入(资产)和相对收入(资产)假说<sup>[15]</sup>以及互联网使用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sup>[16]</sup>。这些研究拓展了低生育率研究的视野,为揭示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做出了贡献。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相似或相近,更多的研究是针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如何鼓励人们生育的政策研究,而很少有对中国低生育率深层原因的探讨,也未回答“很低生育率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前出现”这个核心问题。换言之,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晚婚晚育与少育不育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生育行为时,必定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而对这种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是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现象和有效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首要前提。鉴于此,本研究力图从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揭示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 二、低生育率研究的主要范式

持续低生育率是人口转变结束后出现的新人口现象,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20世纪80年代,低生育率开

始进入人口学家的研究视野,并成为人口研究的热点<sup>[17]</sup>。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持续的很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断深入,其中有5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一是人口学范式,从生育率直接影响因素入手解析低生育率,最具代表性的是“时间进度效应”理论<sup>[18]</sup>。二是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基于新家庭经济<sup>[19-20]</sup>的理性生育决策分析,认为低生育率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压力(尤其是教育、健康医疗、住房和就业等方面成本)和机会成本高企所致<sup>[21-22]</sup>。还有学者提出“顺周期”假说和经济不确定性预期假说:顺周期假说认为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种顺周期关系<sup>[23-24]</sup>,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往往会推迟生育<sup>[25]</sup>,这种推迟效应可以在经济繁荣时期得到补偿<sup>[26]</sup>;经济不确定性预期假说认为,人们的生育决策不仅考虑约束条件和过去的经验,同时还考虑对未来的期望、想象和叙事。因此,个人“未来叙事”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sup>[27]</sup>。三是社会学范式,主要代表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sup>[28-29]</sup>,强调文化变迁(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世俗化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对婚姻和生育的影响。四是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范式<sup>[30-31]</sup>,认为社会与家庭内部性别平等之间一致与否是影响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sup>[32]</sup>。在社会性别平等程度高而家庭性别平等程度低的国家中,因女性面临“工作-家庭”严重冲突而导致低生育率<sup>[33]</sup>,而法国和北欧国家因实行支持“工作-家庭”平衡的家庭政策而获得相对较高的生育率<sup>[32]</sup>。五是制度分析范式,把制度视为塑造个体行为模式的内在力量,强调制度环境、社会规范、劳动力市场条件等对个人偏好、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的影响<sup>[34-37]</sup>。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综合视角分析低生育率现象,如“低生育率陷阱”理论<sup>[38]</sup>。这些范式为低生育率问题研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使相关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上展开,丰富和深化了对低生育率时代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及生育行为模式的认知。

### 三、低生育率研究面临的挑战:生育悖论

现有的低生育率理论、假说和实证结论都面临着挑战: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出现具有普适性或者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在实证层面,尚未得到适用于所有(或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的因果关系。这种挑战的根源既有低生育率国家之间的差异<sup>[39]</sup>,也有同类国家在生育率水平上的分野<sup>[36]</sup>。例如,意大利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国家<sup>[40]</sup>: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仍然是意大利的核心文化<sup>[41]</sup>,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生育率

却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并明显低于许多后现代性更强的西方国家。根据以往的观点,在传统家庭观念影响较强的社会里,生育率水平应该较高,但意大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便形成了一个悖论<sup>[40]</sup>,其中可能的原因曾被认为是经济的相对落后和天主教影响约束下的世俗化延迟。再例如,荷兰完全是另一种生育悖论:荷兰是一个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人口的高收入国家,也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60%以上的人口没有宗教信仰,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相对缓慢,很多人主张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分工模式,几乎没有北欧国家那样的家庭政策,带薪产假时间很短<sup>[42]</sup>。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荷兰却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荷兰许多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与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之间似乎是矛盾的,因而也成为了一个悖论。其中可能解释是,荷兰拥有免费且非常灵活的教育制度,且劳动力市场上没有工资歧视<sup>[42]</sup>。可见,国际社会已然存在“现代化进程较慢但生育率也低”或“现代化进程较快但生育率却不低”的悖论现象,这一方面挑战了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育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因而,这为揭示与讨论中国的生育悖论提供了启发。基于此,笔者将着重探讨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原因。

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和低生育率的出现都非常超前,以往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长期实施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但2013年和2015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两孩”和“三孩”生育政策,生育率只出现短暂的小幅上升,随即又转而陷入更深的“生育低谷”: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比2019年出生人口减少了38%。2020-2022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1.30、1.15与1.07,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绝无仅有,在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也不多见。其中虽然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完全是人们根据自身情况而自主理性生育决策的结果。这个情况彻底打破了对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迷思。为什么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会出现极低生育率?现有理论很难对这一生育悖论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在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发现的一些影响低生育率的因素在中国虽然存在,但其影响还不至于使生育率降到如此低的地步。

中国的生育悖论对人口学家和相关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笔者认为,从不同研究范式的边界及其联结入手逐层剖析或许是一条可行的研究思路。人口学研究范式揭示了初婚年龄和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造成的进度效应,该效应使得总和生育率低估终身生育率<sup>[43]</sup>,但进度效应的边际影响

十分有限,例如荷兰和法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与意大利相同,但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意大利<sup>[44]</sup>。当然,人们为什么会推迟结婚和生育并不是人口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主要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任务。经济学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展开分析,即假设偏好既定和预算约束条件下,人们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根据预期成本—收益比较做出理性的生育决策,经济学没有或许也不需要回答人们的偏好是如何决定及如何变化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低生育率研究而言,偏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当个人或家庭资源在不同用途上存在竞争时,偏好就变得尤为重要<sup>[45]</sup>。偏好究竟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或许应该通过社会学研究范式和制度研究范式获得答案,因为偏好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效用心理的一种具体表达。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学解释了低生育率的第一层逻辑(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学揭示了低生育率的第二层逻辑(生育决策模式),社会学则努力挖掘低生育率更深层的逻辑(偏好的变化)。事实上,在低生育率研究中,社会学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生育率转变研究上,经济学表现得更为抢眼。社会学研究范式强调后现代性对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后现代性的涵义非常丰富,并且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因此,基于后现代性建立的低生育率分析框架具有相对的普适性。但是,这个分析框架也面临着来自现实的挑战,例如,为什么同处于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在生育率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性突出的国家仍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水平(例如法国、荷兰、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为什么一些后现代性相对较弱或者说传统性影响依然显著的国家(如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却深陷低生育率陷阱?中国的生育悖论更是对低生育率理论的挑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今仍未完成,尽管后现代性在现代化大都市和特定人群中已经显现。

#### 四、中国生育悖论的内在逻辑

在没有生育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低生育率完全是个人(或夫妇)行为决策的结果。因此,低生育率的核心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推迟生育?为什么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一些人为什么主动选择不生育?这些问题的答案隐含在中国生育悖论的内在逻辑之中。笔者认为,中国生育悖论背后有以下3个不同层次的逻辑。

##### 1. 经济逻辑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是生育和养育成本压力(包括货币成本和精神成本、直接

成本和机会成本)造成的<sup>[46]</sup>,这个因果或相关关系说明低生育率的内在经济逻辑是成本约束。从直接成本来看,生育和抚育成本、子女教育成本以及子女结婚成本不断提高,形成了预期成本高压。从机会成本看,一方面,女性保持着高劳动参与率,且收入对家庭的贡献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与生育相竞争的需求品越来越多,尤其是地位商品需求旺盛且价格昂贵。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层逻辑,背后涉及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例如,教育成本高可能与教育制度缺乏弹性、竞争激烈以及社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关,也可能与等级制和各职业之间地位悬殊有关。为什么女性的劳动收入对家庭如此重要?这可能反映了女性在职场上的不断崛起、家庭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为什么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如此严重?这可能涉及社会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期望、工作场所的灵活性以及家庭责任的分配等方面的复杂问题。最后,为什么人们对地位商品的偏好如此强烈?这可能与社会对于成功和社会地位的价值观有关,推动了个体追求高消费和高品质生活的动机。因此,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低生育率成因机制的逻辑链条上进一步回溯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不仅仅局限在教育成本高、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等浅表性的经济原因。

##### 2. 文化逻辑

生育决策不仅面临预算条件约束(包括金钱、时间、精力等),而且还面对与其他方面需求的竞争。在预算约束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在不同用途(例如女性在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做出投入抉择,此时,偏好就变得尤其重要。Hakim提出的“偏好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女性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生命周期模式”:生育和就业,或者说,更喜欢“家庭导向”的生活方式,还是更倾向“事业导向”的生活方式<sup>[47-48]</sup>。有研究者把发达国家的女性分为三类:一是以家庭为重的女性,二是以事业为重的女性,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女性(占女性大多数)<sup>[45]</sup>。女性的生活方式偏好和价值观直接决定了她们在生育和工作之间的选择,因此,偏好是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化的背后力量则是后现代性(例如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性别平等)的文化驱动<sup>[28-29]</sup>。中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和工作时间弹性远不及发达国家,并且存在着性别歧视和母职“工资惩罚”<sup>[49]</sup>,但女性却长期保持着高水平的劳动参与率,甚至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女性具有较强的收入偏好,因为收入偏好与收入水

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水平越低,收入偏好就越强。在这一点上,发挥主要作用的不是文化逻辑驱动的偏好,而是经济逻辑驱动的偏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逻辑对中国人的偏好影响不大,恰恰相反,与其他处于低生育率水平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文化逻辑更为复杂,因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元素混合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冲突、碰撞或互动形成了一个低生育的文化场域。

从传统性来看,有3种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第一,婚内生育仍是人们遵从的社会规范,即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被普遍视为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大事”,同居现象虽然逐渐增多,但主要是“婚前同居”,社会普遍不接受婚外生育。因此,当初婚年龄推迟时,生育年龄必然随之推迟。第二,家庭延续观念和亲代利他转化为对后代的近乎无限的责任感。父母责任在子女长大成人并有收入之后继续延续,包括对子女结婚、购房等大额支出的承担或分担,这样的责任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生育远期成本压力的预期。第三,社会等级观念及攀比文化依然流行,并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社会流动期望驱动的内卷式教育竞争,直接推高了教育成本(包括父母在金钱、时间和精力上的直接投入);其二是地位商品和“面子”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使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在这种消费偏好影响下,随着时尚品、奢侈品、汽车、高档小区住房等进入社会地位和面子消费领域,个人和家庭面临着更大的预算竞争压力。因此,传统性主要是通过预期直接成本压力机制,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现代性对低生育率的影响路径主要有4条:第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自主性增强,在婚姻和生育上具有独立性和选择自由,即使是持有传统观念的父母对子女在婚姻和生育决策上的影响力也显著减弱。第二,教育提升了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而增强了其决策理性。第三,高等教育和就业改变了个人生命历程,年轻人(包括年轻流动人口)从离家独立生活到婚姻的间隔拉长,受现代和时尚观念濡染的机会增多。同时,高等教育和就业提高了个人对收入和职业发展的期望,进而提高了对生育机会成本的预期,这些影响在女性当中尤为显著。第四,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进程。中国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程度位于发展中国家前列,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sup>[50]</sup>,女性在教育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虽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但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处在高水平上,在职业发展上也具有较多机会,进而面临着“工作—生育”的权衡。因此,现代性主要是通过机会成本压

力机制降低了生育意愿。

后现代性主要是通过婚育替代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后现代性主要出现在大都市社会,并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且有较高收入的年轻白领阶层当中,他们的信息视野广阔且纵深,权威意识淡薄,追求彰显个性和时尚的生活方式,婚姻替代和子女替代的选择性强。在这个群体中,“超级晚婚者”“超级晚育者”、不婚者以及丁克家庭已是常见现象。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这个群体的婚育行为对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并不大,但当后现代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更大范围内流行时,中国生育率下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剧。

上述因素独立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生育成本张力,当这种张力出现时,生育率转变就被引动,当这种张力达到某种程度时,生育率就会走向很低或极低水平。那么,中国的生育成本张力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程度?这需要进一步的深究。

### 3. 制度逻辑

人们的观念、态度、偏好和决策深受他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力图从制度视角寻找低生育率的原因<sup>[17,51-53]</sup>。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背景、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国家背景影响女性对家庭的偏好,制度和规范影响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sup>[37]</sup>。在这些研究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Esping-Andersen 提出的福利国家分析框架。Esping-Andersen 认为,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动态受国家福利制度的影响,只有从劳动力市场、家庭和国家互动关系角度才能理解低生育率的原因<sup>[51]</sup>。运用 Esping-Andersen 的理论框架,一些学者从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个人生命历程模式差异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差别<sup>[17,54]</sup>。

现代福利国家是导致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制度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成长及其人口行为<sup>[55]</sup>。虽然 Esping-Andersen 的福利国家理论框架可能不适合中国情境,但可以为研究中国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一条有价值的思路,即从“生命历程制度化”角度切入中国生育悖论的制度逻辑。生命历程是指一个人的人生路径,以及在不同年龄上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持续期、间隔及顺序的社会模式<sup>[56]</sup>,反映了社会赋予年龄的社会和个人意义<sup>[57]</sup>。生命历程制度化是指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模式化影响,这些制度安排从身份转换序列和经历两个方面影响个人的人生规划和计划。根据 Kohli 的解释,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有3个基本涵义:一是时间化,生命历程具有社会制度的参照意义,年龄不再只是人口分组标识,而成为生命的结构性核心特征;

二是时序化,即标准化或“规范性的生命过程”;三是个体化,即把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sup>[58]</sup>。生命历程的规范模式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其一是决定个人在生命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其二是影响人们的期望、行为预期和决策<sup>[59]</sup>。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社会制度,在生命任何时点上的行为都会同时受过去经历、当下环境条件以及队列压力的影响<sup>[56]</sup>。因此,生命和生活角色转换的年龄分层是一种决定或影响获取一定社会地位及所需时间的社会机制<sup>[60]</sup>。

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在于,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公权力极大且无处不在的国家行政体制。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个人生命历程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征,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更强烈,以下3个方面的制度影响尤为突出。

第一,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层功能。教育具有社会分层功能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教育越多,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在收入和社会流动上获得更多的回报。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教育制度本身就具有社会分层功能,由于教育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控和分配,以及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的地区分布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教育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产生于3个机制:一是中考分流机制。教育部门对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规定了进入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在过去几年实行的是按1:1比例分流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只有中考成绩排名中位以上的考生才有资格进入普通高中,其他学生则只能进入职业高中。这种分流政策对学生而言是人生的分水岭,是社会阶层的提前分流。二是高考录取名额分配机制。高考录取名额分配是以省为单位,虽然国家出台了录取名额分配的相关调整政策及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但高校录取名额地区分配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使得一些高校数量少的人口大省的考生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三是官方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分层,这种制度性金字塔结构实际上是对进入不同等级高校学生的一次社会分层,在这种分层的影响下,“第一学历”对于个人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这种影响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着严格的学校社会分层,被认为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sup>[39]</sup>。教育是个人生命历程前期阶段最重要的事件经历,并直接决定或影响其之后的人生之路。因此,这种教育制度功能的异化直接导致了激烈的内卷式教育竞争,父母在子女教育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巨大压力下,不

得不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第二,职务晋升的年龄标准规范。职位晋升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形式和主要途径,在中国,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不仅具有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同的一般特征,如就学、就业、退休等方面的年龄规范,而且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实行以“年轻化”为导向的或明确或隐蔽的职位晋升年龄标准规范或“关门年龄”,超过某级职务晋升的年龄上限就意味着基本失去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这种年龄标准规范直接影响这些部门就职者的个人发展预期、规划和行动。在这样的晋升年龄标准规范下,个人发展的机会窗口期被缩短,不仅加剧了职场竞争,提高了生育机会成本,并与生育旺盛期高度重合,使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权衡困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不只限于这些部门,因其使年龄具有了社会分层和流动阶梯的参照意义而影响整个社会。

第三,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占比例长期处于低水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sup>[61]</sup>。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单靠丈夫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可或缺,甚至与丈夫的收入贡献基本相当。因此,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高水平,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也有家庭生计压力方面的原因。这种压力使女性在劳动参与的选择上缺乏弹性,加之劳动力市场上(尤其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着“母职惩罚”<sup>[59,62]</sup>,进一步压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除上所述,中国的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还具有刚性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源于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退休制度缺乏弹性。大多数生育率相对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都具有较大的弹性。例如教育制度弹性较大的荷兰、瑞典、美国等通常具有较高的生育水平,而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制度缺乏弹性(如没有休学、转换专业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极低生育率<sup>[39]</sup>。劳动力市场弹性与生育率之间也存在着正向关系,这种弹性是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具有弹性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可以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规划及时间安排提供更多的选择,但在缺乏弹性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生命历程的模式化程度更高,而个人选择的机会更少,进而给生育带来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

上述3种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是本性的,教育制度是一种社会分层筛选机制,职务晋

升制度是一种社会流动竞争机制,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收入压力机制。虽然这三大机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富裕阶层以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些影响一旦内化于个人的生命历程,就会形成一种制度性的社会行为模式,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其生命历程中的社会角色及转换与家庭角色及转换之间会形成紧张或冲突关系,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工作或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权衡的困境<sup>[53]</sup>,当这种困境成为年轻女性普遍预期的情境时,就会生成一种低生育文化机制和低生育行为的路径依赖。

### 五、结论和讨论

中国出现极低生育率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更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只有深入地剖析这些深层原因,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生育悖论,也才能在政策上对生育危机做出有效应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通过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低生育社会场域或者说结构性低生育陷阱(图1)。经济、文化、制度不仅有各自的作用逻辑,三者彼此之间也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制约或促进作用。除了富裕阶层,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卷入其中。虽然三条逻辑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影响的路径和程度存在着差异,例如低收入阶层更多受到预算约束、成本压力和收入压力的影响,中产阶级则几乎受到三条逻辑的所有作用机制的影响;制度逻辑的社会流动竞争机制对体制内就业群体的影响要大于其他社会群体,而社会初筛和分流机制则影响到所有的青少年。当然也必须承认,所谓经济、文化或制度的逻辑均是基于“理念类型”基础上的概念抽象,现实生活中三者并非泾渭分明、彼此独立,相反却是交织杂糅在一起。因此会发现,经济逻辑中可以看到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作用因素,同理,其他逻辑中也蕴藏着经济逻辑的“影子”。可见,想要彻底剥离开来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制度逻辑不同的作用过程是较为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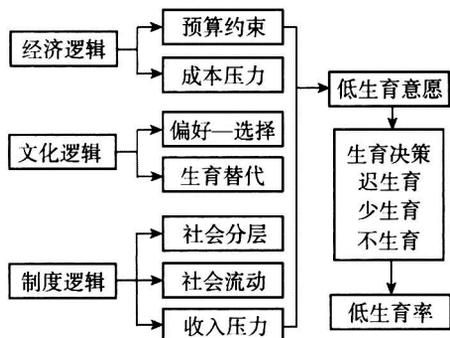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逻辑及作用机制

第二,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混合及

其与经济制度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长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意大利等南欧诸国、德语国家、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及地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混合文化特征。例如,一项对日本低生育率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经济和体制等方面的制度与传统家庭制度规范之间会形成紧张或冲突关系,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工作与生育之间权衡的困境<sup>[53]</sup>。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制度性因素也加入其中。例如,强烈的社会分层意识与教育制度功能异化相结合导致了激烈的内卷式社会竞争,形成了对孩子质量的高度偏好;社会地位标签化、“面子”文化与消费主义相互作用,刺激了对社会地位商品的强烈偏好,产生对生育的挤出效应;女性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别歧视相冲突及劳动保护不足,加剧了女性的“工作-生育”选择困境;传统的彩礼文化与高房价等相遇直接拉高了结婚成本……在多种文化元素的混合效应及其与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仅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处于世界最低水平<sup>[63]</sup>。

第三,个人生命历程的制度性分水岭及路径依赖所形成的激烈社会竞争,对生育具有强烈的压制性影响。分水岭效应源于教育制度对学生的社会初筛和分层;制度性路径依赖是指一旦进入高低不同的人生轨道,就很难从低层轨道跨越到高层轨道,而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将面对高度细分的职级金字塔。所以,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卷入社会竞争,开始爬梯之旅。进入低层轨道的人,一方面因收入低且不稳定而具有更强烈的收入偏好。有研究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性更脆弱,进而显著抑制其生育意愿<sup>[64]</sup>,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sup>[65]</sup>,而在其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遭到“母职惩罚”<sup>[62]</sup>。另一方面,他们期望子女能够赢得自己输掉的教育筛选,因而对子女质量也具有较强的偏好。收入偏好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工作-生育”选择,孩子质量偏好会直接影响孩子“质量-数量”替代。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具有更强烈的个人发展期望和社会流动偏好,同时面对职级金字塔和相对短暂的个人发展机会窗口,因而具有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因此,无论进入哪条人生轨道,都会面对压低生育意愿的力量。

第四,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3条逻辑都具有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在这些构造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其中的社会场域,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模式的文化路径依赖,因为父母或他人的生育行为对整个生命历程影响的经验会直接影响对自己未来的预期。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变化相对缓慢,低生育社会场域

在短期内难以破局,这意味着扭转低生育率局面将十分困难。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压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制度性因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生育悖论的研究思路和初步分析框架,要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做出更大的努力。当然,这也是中国人口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机会。

#### 注释:

①俄罗斯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之所以出现极低生育率,被认为是1990年前后的政治变革及经济转型困难带来的后果,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中国。

####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田思钰.当代青年女性晚婚对低生育水平的影响[J].青年研究,2017(6):16-25.

[2] 顾宝昌,侯佳伟,吴楠.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J].人口与经济,2020(1):49-62.

[3] 李月,张许颖.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1(4):1-11.

[4] 陈友华,苗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低生育率:新机制与新特点[J].人口与发展,2016,22(5):14-23.

[5] 於嘉,周扬,谢宇.中国居民理想子女数量的宏观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21,45(6):45-61.

[6]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J].中国社会科学,2018(8):143-161.

[7] 杨菊华.抑制与提升:丈夫家事分担的生育效应[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4):67-75.

[8] 王广州,周玉娇,张楠.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J].青年探索,2018(5):15-27.

[9] 吴帆.低生育率陷阱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J].人口研究,2019,43(4):50-60.

[10] 陈佳鞠.后生育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差异及其原因[J].人口研究,2021,45(6):62-80.

[11] 吴帆,陈玲.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J].公共行政评论,2022(5):49-65.

[12] 何明帅,于森.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J].劳动经济研究,2017,5(5):117-140.

[13] 陈卫民,李晓晴.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预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兼论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机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8-30.

[14] 丁金宏,程晨,吴航,等.生育行为的社会动力演化及生育政策响应——基于华东地区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

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9,43(5):17-27.

[15] 王晓娟,石智雷.从收入到资产:财富不平等与居民生育意愿[J].经济评论,2022(1):114-126.

[16] 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等.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J].人口研究,2022,46(3):3-15.

[17] BALBO N, BILLARI F C, MILLS M. Fertility in advanced societies: A review of research[J]. Europe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13(29):1-38.

[18] BONGAARTS J, FEENEY G.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2):271-291.

[19]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revisited[M]//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15-28.

[21] DIPRETE T A, MORGAN S P, ENGELHARDT H, et al.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22):439-477.

[22] KOHLER H P, BILLARI F C, ORTEGA J A.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Cause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options[M]// HARRIS E R. The Baby Bust: Who Will Do the Work? Who Will Pay the Taxe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48-109.

[23] ANDERSSON G. The impact of labour-force participation on childbearing behaviour: Pro-cyclical fertility in Sweden during the 1980s and the 1990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0(16):293-333.

[24] SOBOTKA T, SKIRBEKK V, PHILIPOV D. Economic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37(2):267-306.

[25] MILLS M, BLOSSFELD H P.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early life cour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M]//BLOSSFELD H P, KLIJZING E, MILLS M, et al.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Youth in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Advances in Sociology Series, 2005:1-24.

[26] NEELS K. Temporal variation in unemployment rat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empo and quantum of fertility: Some evidence for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A]. Dallas: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0.

[27] VIGNOLI D, GUETTO R, BAZZANI G, et al. A reflection on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The narrative framework[J]. Genus, 2020, 76(28):1-27.

[28] VAN DE KAA D J.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J]. Population Bulletin, 1987, 42(1):1-57.

[29] LESTHAEGHE R, SURKYN J. Cul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8, 14(1):1-45.

[30] MILLS M, MENCARINI L, TANTURRI M L, et al. Gender equ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08(18):1-26.

[31] McDONALD P.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J].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2000, 17(1): 1-16.

[32] McDONALD P. Societal foundations for explaining low fertility: Gender equity[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3, 28(34): 981-994.

[33] ANDERSON T M, KOHLER H P. Low ferti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i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41(3): 381-407.

[34] GAUTHIER A H.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7, 26(3): 323-346.

[35] RINDFUSS R R, BRAUNER-OTTO S R.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mplications for fertility tempo in low-fertility settings[J].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8(57): 57-87.

[36] RINDFUSS R R, CHOE M K, BRAUNER-OTTO S R. The emergence of two distinct fertility regimes in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16(35): 287-304.

[37] BRINI E. Childlessness and low fertility in context: Evidence from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20 European countries[J]. Genus, 2020, 76(6): 1-38.

[38] LUTZ W, SKIRBEKK V, TESTA M R. 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J].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4): 167-192.

[39] RINDFUSS R R, CHOE M K. Diversity across low-fertility countries: An overview[M]//RINDFUSS R R, CHOE M K.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1-13.

[40] TANTURRI M L. Aging Italy: Low fertility and societal rigidities[M]//RINDFUSS R R, CHOE M K.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221-257.

[41] ROSIN A A. Family formation and fertility in Italy: A cohort perspective[M]//ZUANA D, MICHELI G A. Strong Family and Low Fertility: A Paradox?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23-43.

[42] MILLS M C. The Dutch fertility paradox: How the Netherlands has managed to sustain near-replacement fertility[M]//RINDFUSS R R, CHOE M K.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164-188.

[43] 郭志刚.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J]. 人口研究, 2012, 36(5): 3-14.

[44] CALTABIANO M, CASTIGLION M, ROSINA A. Lowest-low fertility: Signs of a recovery in Italy? [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09, 21(23): 681-718.

[45] VITALI A, BILLARI F C, PRSKAWETZ A, et al. Preference theory and low ferti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9(25): 413-438.

[46] 张孝栋, 张雅璐, 贾国平, 等. 中国低生育率研究进展: 一个文献综述[J]. 人口与发展, 2021, 27(6): 9-21.

[47] HAKIM C. Work-lifestyle Cho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Preference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8] HAKIM C. A new approach to explaining fertility patterns: Preference theor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3, 29(3): 349-374.

[49] 杨菊华.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J]. 人口研究, 2019, 43(1): 36-51.

[50] 吴帆, 刘立光. 社会性别平等的测量: 国际指数与中国性别发展[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77-87.

[51] ESPING-ANDERSEN G.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2] RINDFUSS R R, GUZZO K B, MORGAN S P.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22): 411-438.

[53] BUMPASS L L, RINDFUSS R R, CHOE M K,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The case of Japan[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9, 5(3): 215-235.

[54] MILLS M, BLOSSFELD H P.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early life cour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M]//BLOSSFELD H P, KLIZING E, MILLS M, et al.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Youth in Society: The Loser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Advances in Sociology Series, 2005: 1-24.

[55] BELLARI F C. Europe and its fertility: From low to lowest low[J].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005, 194(1): 56-73.

[56] ELDER G H. Family history and the life course[J].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977(2): 279-304.

[57] BENGTON V L, ALLEN K R.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ed to families over time[M]//BOSS P G, DOHERTY W J, ROSSA R L, et al.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58] KOHLI 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ing ahead[J]. Research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7(4): 253-571.

[59] ALDOUS J. Family develop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Two perspectives on family chang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0, 52(3): 571-583.

[60] RILEY M W. Age strata in social systems[M]//BINSTOCK R H, GEORGE L K.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 369-411.

[61] 张广科, 王景圣.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演变、困境与突破[J]. 中州学刊, 2021(3): 22-28.

[62] 申超. 扩大的不平等: 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J]. 社会, 2020, 40(6): 186-218.

[63] 吴帆, 李建民. 中国面临生育危机风险的三个信号: 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9(1): 61-68.

[64] 徐巧玲. 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基于阶层流动的调节效应[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5): 61-73.

[65] 田渊六郎.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J]. 青年探索, 2017(1): 103-112.